

亚洲 在衰落?

Asia Falling? *Making sense of the Asian currency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英) 卡拉姆·亨德森 (Callum Henderson) 著 朱宝宪 王桂琴 等译 宋逢明 校

SINGAPORE \$

NEW TAIWAN \$

KOREAN ₩

INDONESIAN Rp

CHINESE ¥

THAI ฿

PHILIPPINE ₱

MALAYSIAN RM

JAPANESE ¥

HONG KONG \$

MONEY

THU 23:01
INTERBANK RATES

BID ASK

Chinese RMB	8.2785	8.2795
Hong Kong \$	7.7455	7.7465
Indo Rupiah	9200.00	9600.00
Japan Yen	127.78	127.820
Korean Won	1641.50	1642.00
M Ringgit	3.715	3.7450
Singapore \$	1.6280	1.6310
Thai Baht	42.8500	42.9500

经济热点丛书

亚洲在衰落？

(英) 卡拉姆·亨德森 著

朱宝宪 王桂琴 等译

宋逢明 校

机械工业出版社

过去二十几年里,亚洲经济以强劲的崛起之势,呈现出一片辉煌,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和希望。国际资本来势如潮,涌入这块“风水宝地”。潮起潮落,涌动着神秘的亚洲奇迹。

经历着金融风暴的无情冲刷和洗礼,亚洲经济将走向何方?何日再现辉煌?

Callum Henderson: Asia Falling? Making sense of the Asian currency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Copyright ©1998 by McGraw-Hill Book Co-Singapore.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sale in Mainland China onl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McGraw-Hill 公司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98-08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在衰落? / (英)亨德森(Henderson, C.)著;朱宝宪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8.6

(经济热点丛书)

书名原文:Asia Falling?

ISBN 7-111-06471-2

I. 亚… II. ①亨…②朱… III. 金融危机-分析-亚洲 IV. F8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5847 号

出版人:马九荣(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简学 刘露明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880mm×1230mm 1/32·8.75 印张

印数:0001-6000 册

定价:12.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倒页、脱页、缺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译者序

《亚洲在衰落?》是一本关于当前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情况、原因及前景的著作。由于作者多年从事亚洲金融市场的研究与分析,因此,情况熟悉,分析深入,得出的结论令人深思,极具启发性。由于本书作者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同,书中所述有不妥之处,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本书中简称为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均指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地区。

由于时间紧,译者除封面署名者外,还有以下多位研究生参加了全书的初译,他们是:龚白云、王继红、马慧勤、吴伟东、孙彪、王劲松、田锋、杨巨宝、焦小军、张帆、朱天勇、李北葵、孔京文、夏宗智、江晨峰、吴威、倪小东、许明宇、薛炯、李琰、陈磊、张健、周湘、刘立鑫、向滨、孙宇、毛卫、王玮、官建民、张辉、童婕、黄蕾、樊建文、陈秉赋、饶先军、刘玮莉和姜源源。没有他们的努力,本书难以这样迅速与读者见面。在此,特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1998年5月

译校者简介

朱宝宪 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现在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金融与财务教研室副教授,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金融市场与证券投资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出版的著作与译著有《宏观经济分析》、《西方经济学习题集》、《当代金融市场》、《激进经济学》、《投资银行》等,还发表了有关方面的学术论文多篇。

王桂琴 现为清华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系教师,副教授。1986年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特殊用途外语专业,获硕士学位。主要从事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研究和翻译系列课、文化沟通、经贸管理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并多年从事翻译实践工作。现为中国比较文学会翻译研究会会员。

宋逢明 博士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贸易与金融系系主任。同时是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中国大陆首名成员、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金融研究部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重大项目“金融工程”课题负责人。出版过2本金融学著作,在国际和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30余篇论文。

作者简介

卡拉姆·亨德森 是一位货币管理分析家,他服务于以香港为基地的亚洲标准普尔 MMS,这是一家从事金融投资分析的研究机构。他写了大量的关于货币市场危机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援引。在过去的九年中,他一直从事于金融市场的研究与写作。他拥有英国森德兰理工专科学校的政治学、经济学与法语的学士学位,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中东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硕士学位。

致 谢

对那些曾经想写而又尚未动笔写这样一本书的人们,我只能在此以一个过来人的经历实言相告:这是件令人身心俱疲的苦差事。做了数月的研究后,在历时五个月的写作过程中,它几乎占据了我生活的每时每分。也就是说,在完成作为外汇市场分析师的日常工作外,我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本书的写作中。在此种情况下,所有在亚洲标准普尔 MMS 的同事对我表现出了我无法企及的极大的耐心和宽容。我衷心地感谢他们的包容与慷慨,感谢他们的宝贵意见和付出的时间。能与这样的人们共事是我极大的幸运。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香港标准普尔 MMS 的 Meryl Phang、Yolando Ho 和 Tony Ngan,他们是分析中国各领域的专家,以及新加坡代表处以分析东盟国家见长的 David Cohen、Alison Seng、Sani Hamid 和 Andy Tan,最后还要感谢亚洲区分析运作总监 John Lilley 先生和 Ken Ho 先生,是他们允许我在市场振荡失衡的环境下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本书的写作。另外,我还应该感谢 McGraw-Hill 新加坡出版公司的 Paul Tan 和 Tony Lim,他们对本书的出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

对于活跃在金融市场行业中的分析师和经纪人来说,保密性的要求是经常而且必要的。在亚洲,因为保持良好联络关系的重要性和无处不在的“自我约束”的压力,对保密性的要求则显得尤其重要。因此,许多曾经被我访谈的分析师、经纪人、基金经理和中央银行家都要求隐去姓名。他们的要求自然应该得到尊重。本人谨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那些对保密性要求较低而乐于在本书中被引述的人士。我将在文中标明引述的个人观点(隐去姓名或不隐去姓名)及出版物的出处。本书中未经标明的论述均属本人观点。如未经特别指明,书中所有亚洲经济指标均出自亚洲标准普尔 MMS 的经济数据库。

前 言

“货币贸易既无必要，也没有成果，而且是不道德的。”

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年会上，在全球各大媒体、来自各国政府的代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的众多官员面前，马哈蒂尔·默海默德博士语惊四座。

“因此它应该被取缔，应该为法律所不容。”他大声疾呼。这位马来西亚总理，着装无懈可击，焕发着他一贯的领袖魅力，以言辞抗议那些“剥削他人获取利益”的外国基金。他尖锐地指出是他们使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从而迫使马来西亚的股票及债券市场形成一片恐慌的抽逃局面。**“货币交易者发财了——他们的财富来自于他人的贫穷！”**^①

虽然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初现端倪，但发生在亚洲的国际货币基金大会上的戏剧性一幕，或者更确切的说，马哈蒂尔博士的惊人之语并未立即引起国际反响。然而事后某周六晚，他在香港发表的有关乔治·索罗斯的评论却引发了一场论战。乔治·索罗斯是索罗斯基金的创始人和首脑，同时是全球最大的“套头交易基金”——“量子基金”的首席顾问，他似乎正是遭到马来西亚总理尖锐指责的投机分子的代表人。在第二天的简短电视发言中，索罗斯针锋相对地指出有关货币贸易应被取缔的说法荒谬，不值一提。**“在现实情势下干预资本的转换性是引发灾难的最好办法。马哈蒂尔博士本人才是他的国家的最大威胁。”**^②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伊布拉姆，一边支持他的总理，一边迅速采取行动抚平局面，亡羊补牢，强调贸易融资方面的货币交易将会被限制纯属传言。相反，马来西亚并未计划改变货币交易制度，并声明此时应结束尖酸的争论，将精力集中到整顿经济上来。

为平息局面，此举相当勇敢，然而当1997年9月22日星期一

YBA 4/1/05

一早,马来西亚股票市场重新开市,人们却并未相信财政部长的安抚之言,投资者被马哈蒂尔的火爆言辞所惊吓,本已相当动荡的市场陷入一片恐慌。马来西亚股票一开市便遭重创,当天马来西亚综合指数下跌 27.34 点,或者说下跌 3.5%,一泻而至 760.50,而在国际货币交易市场上,美元对林吉特的汇率高达 3.1300。

国际投资者与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同僚们一样着慌,甚至程度还要更深。一家总部设在波士顿的共同基金公司的一位基金经理告诉我,“他发表完那些言论后,我立即打电话给波士顿让他们抢时间,清仓——全部抛出。”他指的是所有股票和债券头寸。^③

事后大约一周,尽管安瓦尔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投资者的信心却遭到严重的挫伤,市场及经济状况则有可能变得更遭。正如世界上所有政客官僚的一贯作风,“投机者”被指责为亚洲金融危机的肇事者——而亚洲经济滑坡则是其后果。如果这样的推理可信的话,那么世上的富人和基金的唯一目标就是掠夺“穷人”以饱私囊。所有这一切不由让人回想起 1993 年 8 月,一些法、德官员对第二次汇率机制危机作出了同样歇斯底里的反应:在一场激烈的突发性市场崩溃面前他们抛弃了,而不是切断了与汇率机制的挂钩。

政客与官僚们习惯于在坏事儿之际责难“投机者”,这与他们自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他们需要一个方便的替罪羊。这便是孙子(或梅特尼兹或克劳斯威茨)的经典名言——声东击西法。“投机者们”是最好的靶子,他们可以信手拈来又虚无缥缈,并且几乎从不反击,至少绝少用言辞反击。索罗斯先生显然是少数例外。投机商们往往对诸如此类的非难嗤之以鼻,而在他们一笔笔成功交易获利中自得其乐。而私下里,那些“宏观”套头交易基金和其他类型的投机商正是以传统的标准和技巧为基础来制定战略的。有位套头交易基金经理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如果一切的经济基准都调整得很好,我们就没钱可赚了。正是由于经济和财政政策出了问题(与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需求不符),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货币或资本市场。”^④

真是一针见血。而索罗斯在公开发言中亦传达了相同的观点。政治家们看到货币危机(暂时)摧毁了他们费尽心血建立的成就而怒不可遏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责难他人总是不遗余力,事实上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政策出现了偏差,我这里并非特指某人,只是一般而言。这并不是说“市场”——无论人们如何定义它——是不可颠倒的。在去年夏天席卷整个亚洲市场的危机中,林吉特、泰铢和印尼盾确实都高估了其基本水准,而市场对政府的裁定往往比政府本身的想法要来得准确。

我认为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具有挽救亚洲长远经济健康的潜力,而不是起摧毁作用。因为整个亚洲,尤其是东盟各国,都正处在十字路口。而谈及放松管制,则应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从而推动及加速市场及经济的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否则危机将入侵,酿成大错,抵消了多年的成长——它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都将是巨大的。

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多年来为外国的直接或组合投资流入亚洲提供了必要的稳定环境,同时使得外国投资者免遭通货膨胀的侵害。但是,显然盯住美元的办法已经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固定的或联系的汇率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除非他们足够灵活以适应经济周期的动荡,同时还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但是,就算这样,或早或迟,失败还是不可避免的。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投机商们对港币发动攻势,迫使香港有关部门通过抛出美元干预外汇市场,同时在货币市场通过准许隔夜拆借利率急速上涨到 300% 以抑制抛出港币的需求。香港金管局的举措之成功不仅仅在于其本身的技巧及决心,而且在于港币有坚强的经济基础和 1 美元兑 7.8 港币的联系外汇系统作后盾。驾驭经济在最好的时局下都相当不易,而在固定或联系汇率的系统下则尤为不易。香港当局必须保持警惕和灵活作风,否则投机商还将乘虚而入。

关于亚洲就谈到这里。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对美国、欧洲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由于这将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在本书中作详细阐

述,这里仅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将给西方经济及资产价格造成相当的通货紧缩风险。对美国而言,这也许正是为什么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要设法缓和强劲通货膨胀威胁的原因——虽然股票投资者们不以为然。在欧洲大陆,由于欧洲银行与亚洲的大面积接触,很有可能威胁到欧洲刚刚出现的十分脆弱的经济复苏,这对于刚刚启动的欧元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本书的具体构想始于1997年初,但其内容是基于本人对于这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就的地方的长期和深入的关注。这成功的机制建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政治动荡、不断冲突和掠夺压迫的基础上。目睹这样的巨变是惊心动魄的。短短三十年内,亚洲做到了欧美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达到的经济腾飞。伴随这个“东亚奇迹”(世界银行对此现象的著名描述)是一系列或正面负面的副产品。亚洲的腾飞演变成了一场经济景气——在这种情况下,总会有许多陷阱突然出现。新的有关“亚洲价值”的学说创立了,它解说着东方的崛起,西方的行将衰败。人们寻找着各种最显见的答案,而且通常这样的答案总是很快就被找到。一时间,亚洲的市场和经济似乎只会上升。

然而世界上没有这样简单、这样永恒不变的事,在金融市场上尤其如此。所有的繁荣都会胀破,所有的泡沫都会爆裂。市场,乃至真实的经济总是在不断波动。而亚洲在一段时间内打破或者说扭曲了这一规则,年复一年处在闻所未闻的成长中。那些美好的故事,整个亚洲地区,整个经济状况听来都那么不可抗拒,直到它们被世界市场的压力所摒弃,这才是真正不可抗拒的力量。对许多人来说,似乎直到1997年7月泰铢的贬值才拉开危机的序幕,而实际上,危机已经酝酿了多年。

在香港,受冲击的地区市场危机被比作“台风”。现在,这场可怕的台风似乎稍有减弱。金融市场终于可以找出时间静静反思——不仅找出过去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也要尝试预测未来我们要走向何处。这样的反思将是十分短暂的。亚洲变化的节奏

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快,许多评论家对于亚洲的吹捧甚至超过了它本身已经相当惊人的能量。那些曾经宣称 10% 或更高的增长率对于亚洲属正常、自然的,是不会停止的,近乎是天生的人们现在何其沉默。同样,那些持悲观论调者则马上宣称“太平洋世纪”已然结束,不是因为所谓“太平洋世纪”本身就值得商榷,而是因为这次危机意味着亚洲奇迹的结束。于是,人们又匆匆地寻找到了最显见的答案。诸如此类的评说都不是理性的经济分析,而是神经质的僵化的反应。基于此,本书尝试填补这些理解上的鸿沟。正如欧洲汇率机制所引发的金融危机(1992 年 9 月,1993 年 8 月)、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 年 12 月~1995 年 3 月)和亚洲金融危机给予我们的警示:金融市场每时每刻对各国政府和经济的检验是铁面无私的,对于那些它认为没有良好秩序的经济和政府,它将毫不留情。这些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是千真万确的。人们可以在萧条的街市上,在失业者、无家可归者以及所有对危机无招架之功的人们身上明明白白地看见。然而,只是一味责备投机者会使人弄错了病因所在。

想使亚洲保持在 80、90 年代取得的惊人增长速度,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了,但这绝不是坏事。正如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所说:对于一个长期健康的经济来说,保持持续稳健的、非膨胀的、以生产力为主导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而以暂时性、周期性的因素,如宽松的信贷、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庞大的引人注目的基建项目为驱动的成长必然面临重大滑坡,甚至崩溃。

许多东盟国家将面临重大经济滑坡,这是个痛苦的历程,但终归胜于崩溃。而泰国和印尼显然没能逃脱崩溃的厄运。他们面临的是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的双重打击。不可否认,泰国的新宪法在规避政治灾难上起了积极作用。在香港的国际货币基金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们肯定了泰国当局对危机反应的迅速和决心。这种迅速行动对于迅速恢复各方,其中包括金融市场、投资者、泰国国民的信心十分必要。在韩国,新当选的总统金大中,无论他本人的素质如何优秀,他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改变政府风格——前

任政府可怕的信用政策已经导致了目前的严重问题。韩国同样面临经济衰退的威胁,也就是说,决不仅仅是增长速度减慢而已。

而对于马哈蒂尔博士,他的严辞责难是可以理解的。他和他周围的同僚,尤其是副总理及财政部长安瓦尔·伊布拉姆领导着马来西亚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他们是值得敬佩和赞扬的。而在西方,这样的推崇太过缺乏了。今后亚洲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都要求人们以更加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同时应对金融系统进行严肃深刻的改革。在这些首要任务中,最重要的是稳定各项基本经济指标,放松控制,相信市场能够找到合适的货币水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应该由以出口为驱动的经济转向以消费为驱动的经济,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将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坚实的国内市场之上。

资料来源

- ① Keynote speech given by Dr Mahathir Mohamm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IMF and World Bank,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Hong Kong, September 20, 1997.
- ② Televised press briefing given by George Soros,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Soros Fund Management, at the annual IMF/World Bank meeting, at the HKCEC, Hong Kong, September 21, 1997.
- ③ Interview with Boston-based U. S. mutual fund manager, Hong Kong.
- ④ Interview with a fund manager from the Quantum Fund, New York.

目 录

译者序

译校者简介

作者简介

致 谢

前 言

第一章	目标——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	1
第二章	骗局——狂热的新兴市场	13
第三章	警告——美元对日元比价的反弹	26
第四章	前车之鉴——墨西哥	48
第五章	催化剂——泰国	66
第六章	解体——依次倒下	89
第七章	后果——相互指责	118
第八章	银行家——日本的曝光	193
第九章	基本情况——问题、机遇与挑战	148
第十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鲁宾和索罗斯 在摆脱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193
第十一章	危险——中国幸免于难还是将 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199
结束语		213
亚洲新兴市场发展大事记		220
参考文献		258
缩略语		260

第一章 目标——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

在其最后短期的崩溃之前,亚洲经济的增长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所要说的是其整体的毫无抵抗的崩溃,并非其中某些国家的个别现象)。在把国内人口的巨大生产能力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过程中,亚洲经济的增长,使整个局面改变与保持了下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生产力、增长和投资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尽管开始的基础较差,主要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的势头迅猛,同时伴随着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亚洲成功事例的动态统计数据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给出。在此仅列出一组初始的提示性数据:以1980至1990年间的人均实际GNP增长的百分比为例,韩国,121.8%;台湾地区,88.0%;香港地区,64.2%;新加坡,77.5%。而实际收入的增长更令人印象深刻:韩国,115.8%;台湾地区,102.7%;香港地区,60.0%;新加坡,79.8%。^①

关于国家与地区的增长水平,从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合在一起的角度看,在1980至1991年间,其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7.3%。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无疑会给今年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冲击。正如标准普尔MMS所预期的,在1998年,亚洲整体的GDP增长将为零(主要受到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但一两年后,这个增长率将回到5%~6%。这 and 正开始从经济停滞中走出来的西欧相比,甚至和许多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们为略高于3%增长所带来的通胀结果而头痛的美国相比,还是可见一斑的。

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毕竟,不久前亚洲的区域战争和冲突比其以前的经济业绩更出名。为了观察亚洲在走向何方,首先我们需要从地区增长背后的基本事实和引起短期崩溃的缺陷

和失误的角度,看它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虽然理论界对已经持续 30 年的亚洲经济成功后面的原因分析存在分歧,但基本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主要归因于亚洲的价值观、习惯作法和公众观念(重教育、家庭和团队,而非个体和网络);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应归因于外部的财政和经济因素,比如货币流动、外国投资、技术转让等。虽然这两方争论各有所长,但不能过于简单地对待这个问题。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在马来西亚总理和索罗斯的争论中,马来西亚的二号人物,副总理安瓦尔·伊布拉姆在有针对性地回答一个关于亚洲“经济奇迹”的问题时说,那不是奇迹,而是十分艰苦的努力。^②

的确如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成功的故事,反映了一个由政府引导的市场和政府单一组合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好是坏可以讨论),这个平衡是在同等水平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不存在的。成功故事的关键在于,审慎的宏观管理,就象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东亚奇迹”一文所描述的“建立正确的宏观经济管理基础”。^③

亚洲政府培育了一个有利于私人国内投资快速增长的环境。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还建立了强大的中小学教育体制,用纯粹的经济术语来讲就是**扩张人力资本的基础**,当然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特别高的国内储蓄水平为支持私人投资提供了保障。当然这并非偶然,因为政府创造了储蓄飞速增长的条件。在审慎的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而又保持相对高的实际利率来吸引国内储蓄(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除外)。从 1980 年至 1990 年,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东盟和印度的总国内储蓄率平均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30.6%(国内生产总值和私人、政府总消费开支的差额为国内储蓄率)。^④相对于其它发达国家(暂不考虑发展中地区),这是一个极高的数字。在 1996 年,这个数字为 32% 左右。相比之下,美国的数字为 17.5%,西欧为 12%,^⑤而亚洲的储蓄率也明显高于拉丁美洲。早在 1990 年,在经济快速成长中的亚洲,其储蓄率曾高出拉丁美洲平均水平二十多个百分点。^⑥后来,由于拉丁美

洲建立了强大的政府(或私人)养老金体系,这个数字才下降。

谈到相关的国内税收负担,1996年,新兴工业化国家、东盟、中国和印度平均的政府开支为17%。鉴于美国和欧洲的GDP水平绝对高出上述国家和地区很多,因此这样比较未免有些扭曲实际情况。然而,美国人和欧洲人通过查阅自己的税单就很容易地知道,亚洲保持了比欧美国家高的储蓄和比他们低的税赋。无论是从经济理论还是从过去三十年的实践来看,保持高的政府和私人投资水平的深奥的经济结果是经济本身在起作用。审慎的政府政策从微观和宏观水平提供了形成高储蓄的土壤,但是不能说这些政策本身没有充分地使亚洲各国政府通过加强监管来支持银行和金融系统,为其国民提供一个安全的储蓄环境。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你可能会说对于资产贬值和信用泡沫的滋生、蔓延,有力的监管并不充分。但是,我在这里强调,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相对于二战后的前二十年亚洲前进的步伐很快,而金融危机仅仅是由于后来各国中央银行在某些问题上采取比八九十年代更加紧缩银根政策的结果,这些问题包括非履约贷款、资本充足率、储备需求。

在亚洲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农业的地位逐渐开始下降,政府寻找可利用资源的生产力和效率的最大化。如果城市和乡村发展严重不平衡,而且相对于工业基础的发展,农业基础发展下降过快,这就会引起对农村、社会和政治潜在的不良反应的担心,因此政府不愿对农村和农业过重课税。

所以,亚洲国家政府“建立正确的基础”,创造了高储蓄率和低税赋,提高了农村和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这仅仅是亚洲成功故事的一个部分。在寻找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逐渐放宽政策和打破常规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也在寻求慎重与合适的干预政策,以便促进特殊部门和行业的发展,主要是出口型行业和部门的发展。政府对其贷款,包括对重工业、化工产业、计算机电子产业贷款,给予支持和优惠政策(有些时候是全面的,有时则取决于各国具体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促进国家发展,国家成立